

明清科舉夢兆中的「天榜」想像

陳海茵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雖然唐代以來便有「官皆由天」之說，但「天榜」一詞最早卻見於宋代，當時所指為唐代進士登第時，書有進士姓名之「榜帖」，無關鬼神志異之色彩。然而明代中葉以降，「天榜」卻成為科舉預兆故事中的常見類型，尤其是「夢天榜」，流傳許多「夢中見榜而現實成真」之事，從當時墓誌銘與傳記等生平資料來看，擁有一天榜經歷可視為一種顯揚聲名的獨特備註。在文人筆記的傳鈔變化之中，天榜甚至成為明清之際勸善思想影響下的功過格之例子，具有揚善罰惡的功能。清代以降，天榜的故事類型更趨豐富，除了最基本的夢兆成真之外，尚出現許多夢與現實有巨大落差的記載，甚至有些還帶有惡作劇色彩。志怪筆記中則透過天榜之說，展現一種特有的他界想像。

關鍵詞：天榜 前定 夢兆 科舉預兆

明清科舉夢兆中的「天榜」想像

陳海茵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所謂「學而優則仕」，中國文人向來視參與政治為展現個人理想的最終目的，但在科舉考試尚未出現以前，踏上官場之途多仰賴優異強大的家世背景，雖有其他察舉品鑑之舉措，終究未若後來科舉影響之鉅。尤其是明代以後，科舉成為士人唯一晉身之途徑，所及影響範圍不僅針對讀書人此一群體而已，對於整體的社會發展、文化氛圍，乃至生活習俗皆有關聯，自然也反映在當時民間所流傳的各種故事中，尤其是明清之際的各種小說筆記，都可以看見許多關於科舉的描述。

在眾多故事記錄中，獲得科舉預兆始終是熱門的主題，透過不同途徑使人預先得知與科舉功名相關的訊息，其中夢境之預兆實為大宗。本文主要討論明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名為「天榜」的民間傳說，其內容描述在科舉考試以前，透過夢境或者奇遇的形式，事先得知科舉結果，當時稱此預兆內容為「天榜」。本文將「天榜」視為明清時期與科舉題材相關的敘事文本中的一種主題，其必須具有「得知天榜」此一情節單元，以下將先梳理此「天榜」的詞語來源，並爬梳過往類似情節的科舉預兆之故事，其後觀察觀察「天榜」在文本中所發揮的功能，以理解天榜說為何能在明清兩代產生莫大影響力，並將以清代出現的幾則與天榜相關的志怪故事為例，分析闡釋此「新瓶裝舊酒」的故事，因著被建構出的他界想像而產生若干變化。

二、天榜的背景與相關故事之產生

(一) 「功名前定」之觀念與夢榜故事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出現後，中國的政治選才形式出現巨大改變，眾多讀書人前仆後繼地參與科舉活動，只求「一舉成名天下知」，縱使結果不一定盡如人意，但就社會流動的角度而言，相較過往，確實大大影響了社會階層的組成。科舉考試之後，迎來的是「為何是我上榜／落榜」等種種心境變化，個人或有志得意滿、感謝天地，抑或檢討自己不夠努力、甚至揣想臆測他人上榜之不公平等等，在在展現出放榜之後，幾家歡喜幾家愁的景況。然而，上榜與否終非個人聰明才智與努力向學便能如願，考試過程中含有太多己所不及之因素，人心惶惶無措之餘，難免會疑恐此間背後或有何種神秘力量之操作，且自古以來，人面對生命中遭逢的吉凶禍福，總不免思考冥冥之中誰能主導一切，甚至認為人類的生存與活動可能受控於「神秘主宰者」之安排，而此一神秘主宰者則往往以「天」^①代之，故生命底遭逢的種種福禍得失，皆與「天」之安排有關。

在上述脈絡下，面對考試或者選才這種關乎人生重大命運轉折的事件，人們自然也產生「功名前定」^②的說法，此類「官皆由天」的故事早可見於唐代文本

① 此處的「天」亦有不同的詮釋，若人視「天」為「人格天」，即天具有思維、慾望、喜好等人性特質，則人將得以透過祭祀溝通等交涉手段，影響天命的意志甚至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而當事者便能改變註定好的吉凶禍福。相反，若人視「天」固定的、機械性的宇宙，則人只能任憑命運主宰，一切無法預知且干涉；然而陳寧指出二者並未因此成為二元對立的思維系統，反而逐漸形成一種具機械宇宙與鬼神存在之雙重性宇宙觀，人之禍福乃係由機械宇宙與鬼神共同決定，人類可透過與鬼神交涉而預知命運，但不一定能夠改變已測知的命運，因為機械宇宙無法受到干涉，也因此關於人們對於已知命運能否改變，便產生種種詮釋差異，對照本文所討論的天榜故事，其所反映的各種結果，正是人面對命運的不同理解。參考陳寧：〈命運可預知而不可改變之觀念的產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6卷第2期（1996年6月），頁147-160。

② 類似用法者有「定命」或者「命定」者，如班固〈幽通賦〉云「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李善注曰：「曹大家：『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

中，^③今從留存的唐五代傳奇志怪中，可見有《定命錄》、《續定命錄》、《前定錄》與《感定錄》等書，李劍國從這些作品中彙整出「宿命主題」，^④故事往往認為士人能取得功名，皆是上天事先選定的結果：

這些作品反覆強調的是「天下之事皆前定」（《感定錄·李泌》）、「人事固有前定」（《續定命錄·韓皋》）、「陰鷲之定，不可變也」（《續玄怪錄·定婚店》）、「人遭遇皆繫之命」（《紀聞·王儼》）。科名是前定的，榜上有名沒名，中第幾名，都由冥冥決定——「名第者，陰注陽受」（《玉堂閑話·高輦》）。官祿是前定的，做上官做不上官，做什麼官，做幾任官，在哪裡做官，都已命中注定——「官職祿科由天者」、「官皆

神先定之，故為徵兆於前也』」，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1986年6月），頁642-643。又如《宋書·顧覲之傳》云「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著《定命論》」，其皆有禍福壽殃由天命所定，隱約強調人在其中「無能為力」之意，見（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卷81，列傳第41，頁2081。本文採用「前定」為題，則出自明清小說時常引用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之語，如《初刻拍案驚奇》卷12〈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開場詩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一時戲語，終身話柄」，見（明）凌濛原著；石昌瑜校點：《拍案驚奇》（南京：江蘇古籍，1990年），頁196。或者《西遊記》第39回〈一粒丹砂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談到烏雞國王所受劫難全因昔日捆觀音受水刑之緣由，故「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見（明）華陽洞天主人校：《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1990年，《古本小說集成》影印金陵世德堂本），頁991。此外，由於本文觀察明清科舉夢榜故事時，發現有些故事著重的是天命「前」定之下，著重其「後」事發展的情節，此亦成為本文觀察重點之一，故以「前定」為題，以說明其後尚有變化之可能。

- ^③ 《太平廣記》卷146至160「定數類」有許多例子，例如卷146〈授判冥入官〉記載唐太宗入冥後，歸來給一小吏官職。或者卷148〈張嘉貞〉記載唐玄宗記錯欲提拔為相的張嘉貞之名，夜裡有人提醒等等。
- ^④ 李劍國將唐代志怪傳奇分為十大主題，這些主題不一定單獨成立，有時可能同一篇文本以不同角度檢視，即有多種主題，其中「宿命主題」又可概括為四種類型：一、君臣邦國的祥福禍興衰歸之於天命；二、通過術數手段預測固有命運；三、經由夢示夢驗的形式表現天命；四、宣揚個人的年壽、科名、官祿、婚姻乃至大小種種事情都由命中注定。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4。

由天」(《朝野僉載》)、「一官一名，皆是分定」(《會昌解頤·麴思明》)。^⑤

此中許多故事乃係透過夢示、夢驗的形式表現天命，例如《太平廣記》卷149〈杜鵬舉〉、卷154〈陳彥博〉、卷277〈裴元質〉、卷278〈國子監明經〉等等。一直到明代，此類關於科名的夢兆仍是常見的故事主題。^⑥陳振禎將夢兆內容分成「與科舉並無直接相關者」以及「直接以科舉為主題的夢象」，^⑦前者往往是榜發之後才能領悟，例如必須透過文化傳統、歷史典故等象徵解讀，或是各種謎題式的線索，後者則是直接夢見考題、考場、榜單等等，這些夢中訊息與現實結果結合，成為故事主題的大宗，雖然夢中所聞見者各異，但無一例外透露的都是士子對於科舉功名的焦慮與企盼。

各種接獲預兆的故事中，「夢見榜單」無疑是最能影響人心的一種，除了上述所舉唐代故事以外，宋人洪邁(1123-1202)《夷堅志》乙卷40〈樂清二士〉所載的兩則士人所夢榜單應驗、《夷堅支志》乙卷2〈黃溥夢名〉的黃溥為應夢中榜單而更名，其他尚有《夷堅志》甲卷17〈陳茂林夢〉、《夷堅支志》戊卷6〈余氏婢夢報榜〉、《夷堅支志》己卷6〈程采夢改名〉等等，都是關於夢中榜單如何影響人心，甚至使夢醒後的人如何在現實中作出相對應的舉措，這類型的故事在明代甚至成為夢占之說的重要依據之一。^⑧

^⑤ 同前註，頁75。

^⑥ 葉楚炎指出宋代以來功名前定故事中，大致透過「奇夢、瑞兆、卦辭、還陽、神語」幾種方式使當事人事先獲知功名訊息，其中奇夢可說是最為常見者。見氏作：〈科名前定觀念對明代小說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2009年3月)，頁21。

^⑦ 陳振禎：《中國科舉識兆文化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1年5月)，頁48-49。

^⑧ 明人陳士元(1516-1597)集歷代諸家夢說著有《夢占逸旨》一書，其中卷六「科甲篇」記載三十餘條歷來史書、筆記小說、文集等夢兆主題故事，上述唐宋諸例亦可見於其中，可知人們對於夢兆所指示的科舉功名之可能，始終不敢輕忽。同時此書也展現了明代人對於夢的看法，陳士元於書中卷1〈真宰〉論及夢云「魂能知來，魄能藏往。人之晝興也，魂麗於目；夜寐也，魄宿於肝。魂麗於目，故能見焉；魄藏於肝，故能夢焉。夢者，神之游，知來之鏡也。」換言

明代中期以降，夢榜故事逐漸出現一種此前未見之說法，其本事情節大抵與前代夢榜故事相類，但卻出現「天榜」一稱呼，相關故事由明至清越趨興盛，甚至成爲一種民俗信仰的體現。⁹清人俞樾（1821-1907）曾對天榜的出現有過疑惑，其云「按世俗每言有夢見天榜者」，觀察此現象並且「考之載籍」，卻發現縱然有諸多類似例子，但這些例子皆未曾出現「天榜」一詞：

唐人《前定錄》載陳彥博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之，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此近乎天榜矣，而不言榜。又《感定錄》載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此言榜矣，而不言天榜。天榜之說，流俗所傳，然自唐宋以來，士以科名為進身之階，則冥冥中，或有豫定其籍者，亦無足怪。¹⁰

俞樾認爲，陳彥博所見者近乎天榜，乃因觀看榜單時身處於一華麗甚盛之所在，且看見發光尺牘（即榜單）；李固言之事則有明顯的「榜」之存在。言下之意，暗示凡稱天榜者，約莫需要有一「天界」之所在，現實中的「榜」是否出現則並非必然，故「天榜」一詞暗示在現實世界以外的「他界」存在一份神祕未知的「科舉榜單」，榜上人名與現實榜單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透過作夢、遇見奇人、偶入他界等傳達形式於「放榜前」令考生或第三者得知此相關訊息，進而作出若干相應舉措，後果雖不一定確實如驗，卻也影響甚鉅。

本文跟隨俞氏之疑惑，以「夢榜現象早已出現，緣何又見天榜之說？」爲問

之，夢境是人的魂魄不受肉體限制而四處遊走且鑑往知來的結果，可想而知科舉夢兆之於明人的影響較之以往更爲深刻複雜。（明）陳士元撰：《夢占逸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葉2下-葉3上。

⁹ 參考白金杰：《清代科舉民俗考論》（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5年5月），頁35。

¹⁰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70冊影印春在堂全書本），卷10，頁549。

題意識，爬梳明中葉以降出現「天榜」一說的文本，逐漸發現「天榜」除了是一種夢兆類型之外，也是出現於當時為科舉功名之難測的後起解釋，其能夠逐漸於明清兩代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原因，並不僅僅在於說明夢境、附會現實之功能而已，甚至成為透過眾人口耳相傳與文字記載所建立的他界產物，其獨特脈絡也對風俗人心起上勸善的功用。

（二）新的夢榜之說——「天榜」

俞樾認為「天榜」故事與唐宋功名前定故事系出同源，卻不明白何以唐代典籍未見「天榜」一詞，故俞氏假設此源頭，興許源自後來的民間傳說，若根據俞樾所言以檢索唐代典籍，確實未見「天榜」一詞，但在宋代時，卻可見零星記載。

目前所見最早「天榜」一詞的出處應是北宋孫光憲（900-968）《北夢瑣言》卷四〈陸辰相六月及第〉，內容描述唐代文人陸辰（847-905）因伴唐僖宗避暑梁洋後，獲得宰相韋昭度（?-895）之關注，同年六月陸辰登科狀元，卻遭遇同儕的嘲弄。陸辰被嘲弄之關鍵緣於其「晉身時間」的名不正言不順，由於唐朝制舉考試雖無固定時間，六月卻是唯一不曾舉辦過的月份，¹¹故此一非常登科事件遂使得陸辰在之後某年的盛夏時節，被翰林署同僚趁此炎熱天氣調侃陸辰云「今日好造天榜」。¹²

表面上看來，陸辰的翰林署同僚所言「天榜」似乎就是現實中的榜單，但其後李昉（925-996）編《太平廣記》的描述則較《北夢瑣言》更為詳細一些：

陸辰舉進士，屬僖宗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止逆旅。辰為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復使何人為主司？」辰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辰致意，榜帖皆辰自定。

¹¹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6。

¹²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第2841冊），卷4，頁25-26。

其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辰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¹³

《太平廣記》說明陸辰被嘲笑的原因在於其「榜帖自訂」，此處所謂「榜帖」者，乃係唐代進士登第後，「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¹⁴換言之，陸辰一事中的「榜（榜）」並非公告性質的名單，而是個人的考試結果通知。此外《北夢瑣言》與《太平廣記》的另一差異在於後者僅使用「榜（榜）」，並未出現「天榜」，同事見載於《新唐書》時，亦稱此事為「造榜」，當時另外一部類書《紺珠集》甚至將之記為「造榜天」。故知「天榜」一詞應非當時常用熟語，甚至有傳鈔訛誤的可能，自然並非明清時期被文人士子或其他有心人夢見的神祕榜單，更無天命前定或者鬼神他界之說的志異色彩摻入。¹⁵

直至明代中葉以降，天榜逐漸成為某些文人士子科考經歷中，具有異樣色彩的一筆，明清兩代皆可見於各種真實的傳聞筆記之外，例如俞樾之所以會對天榜有所發想，乃因自身所聞：

¹³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83，頁1370。

¹⁴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第316冊），卷5，頁30。

¹⁵ 宋代著作可見「天榜」且與本文主題相關者，多為孤例，例如邵雍（1011-1077）《夢林玄解》云「士人若夢天臺山劉晨阮肇逢二仙事，則名『登天榜』」，見（宋）邵雍纂輯；（明）陳士元增刪；（明）何棟如重輯：《夢林玄解》（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崇禎刻本），卷5，葉31上。劉晨阮肇入天臺乃係魏晉南北朝著名志怪故事，然而此處「登天榜」之說，應指若夢見劉阮之事，則暗示現實中將有上榜的可能，換言之，「天榜」在此仍舊是皇榜的代稱。另外《增修埤雅廣要》卷36有「避馬涼字」一則，談到某黃冠（案：道人、術士之流）預測甲魁為「馬涼」，放榜結果卻是「馮京」，此黃冠自云「天榜未動，機不敢泄。」見〔宋〕陸佃；〔明〕牛衷增修：《增修埤雅廣要》（臺南縣：莊嚴文化，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代天順元年吳從政刻本），卷36，頁865上。《增修埤雅廣要》為明人牛衷（?-?約莫1453年前後）以宋人陸佃（1042-1102）所著《埤雅》為基礎所增修者，故此處「天榜」之語可能並非宋代陸佃原文。

今又聞諸杭人，魏元名然乙，道光元年舉行恩科鄉試，魏於是年正月夢觀天榜，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寤而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恩科鄉試，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年二十四年矣。¹⁶

而此則天榜軼聞引起他格外關注的原因，正是由於俞樾生於道光元年（1821），他甚至與此天榜主角「魏元」同科中式；換言之，倘若魏元確實曾在道光元年見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鄉試榜單，則俞樾非常好奇當時那份天榜中，是否有尚未出生的自己，甚至由於他年幼時曾改名，「名且未定，而鬼神安得而豫知之。是不可思議矣」。從俞樾的省思可以窺探明清時人對於功名前定之說的懷疑，這種懷疑造就出豐富的想像，甚至成為科舉題材的鄉野志異中的重要故事主題。¹⁷

三、真實與虛構的敘事功能

（一）紀實：個人生平的記憶亮點

明代中葉以後，「天榜」一詞於民間已不再是「現實皇榜」之代稱，¹⁸特指以夢兆型態出現的預言榜單，目前所見最早文字記載多是明代萬曆（1573-1620）以

¹⁶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0，頁549。

¹⁷ 例如清代道光年間鄭光祖（1776-?）曾提到當時鄉里人士中有一「王老鬼」，因其「言之非真者曰鬼話」，且「其言殊動聽，士庶咸樂聞之」，鄭氏忿其惑眾，故錄之為戒。從鄭氏之紀錄，可揣見所謂王老鬼者應是善於說書之人，其能掌握的題材眾多，又能切中聽眾之所好，其中便有「春會秋鄉先有人夢見天榜」。見（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青玉山房刻本），雜述5，葉47下。

¹⁸ 天榜即皇榜的借代用法，一直可見於詩詞或者史書中，直到明清時期文人仍舊會使用，例如黎淳（1424-1483）〈送吳原博修撰歸省〉云「天榜不緣人力助，親庭特受聖恩歸」。又崇禎時期民間曾有嘲諷政治的謠諺：「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內閣翻成妓館，烏龜王八篋片，總是遭瘟」見（清）文秉：《烈皇小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39冊），卷4，頁52。

後的方志、家書、個人詩集、回憶錄等各種構築文人行跡的材料，例如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戊辰科進士劉伯燮（？-？），曾於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寫有〈示兒賦〉一篇，形式上模仿〈離騷〉自述身世，其中述及自己與兄長的科考歷程時，便稱戊辰年有「市兒李氏春告余以夢寐」，並有小字附註云「有李氏者夢觀天榜見余第一名」。¹⁹無獨有偶，另一位同是戊辰科進士沈懋孝（1537-1612）述及與繼母張氏的往事時，也有類似的「被他人告知上天榜」的經歷，此段紀錄出現於沈作《賁園草》的〈先慈張太安人懿行述〉中，描述沈氏參加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浙江鄉試之前，其繼母張氏夢見沈懋孝過世的親生母親俞氏入夢報信：「是歲，母夢先妣俞謂之曰『兒名已上天榜，吾喜來相報，謝姊氏殷懃訓此兒也。』乙卯不孝孤果得解額于鄉。」²⁰值得一提的是，同文已說明俞氏生產沈懋孝過後不久旋即過世，故幼時沈懋孝並不清楚親生母親另有其人，然而他童年大病時，卻夢見親生母親入夢探望。此段神秘經歷頗有魏晉志怪筆法，²¹也為他的生母俞氏與他（及家族）之間帶來更多的特殊連結，或因此番神秘經驗，使得後來張氏夢見俞氏之事凸顯出一種溫馨神秘的親情傳承之感。

崇禎進士沈泓（？-？）的天榜經歷亦為市井之人所夢，且是以一種隱晦的訊息暗示，此事見於沈泓友人錢士升（1574-1652）所寫的一篇詩序〈懷謝軒詩草序〉：「悔庵幼孤，事母至孝，母天年終，席藁泥土，淚痕為漬。方其登賢書，時都人士夢天榜放第二人為孝子，已而榜發，則悔庵也。」²²從以上可知，天榜既

¹⁹（明）劉伯燮：《鶴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1冊），卷3，頁270。

²⁰（明）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9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30。

²¹根據沈懋孝所述，其五歲時曾有大病一場，夢中見一名「美夫人」前來，自稱其母，並稱捨不得他，夢醒與他人講訴此事後，發現夢中女子的特徵確實與他無緣見面的親母相仿。這種透過夢中人之穿著與現實中墓塚之物的互相呼應，而得到「微實其事」的效果，是志怪敘事的一種重要情節，參考謝明勳：〈六朝志怪「冥婚」故事研究：以《搜神記》為中心考察〉，《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280。

²²（明）錢士升：《賜餘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冊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錢佳刻本），卷3，頁456。

是市井好事之人的談資，也是讀書人家庭裡重視的祥瑞徵兆，現況便是時人將天榜經歷視為生平事蹟中值得誇耀之處。

除了自述或者親近之人的描述之外，在地方志中亦可見類似記載，例如萬曆舉人何三畏（?-?）所纂修的《雲間志略》，內有〈王中牟雷菴公傳〉一篇文章，記載嘉靖時人王涑（?-?）的天榜事蹟，內容稱王涑元配楊氏病篤之餘，「夢見天榜得公名」。²³夢聞天榜者並不一定是當事人關係親近者，但若是親族的女性時，或許是病篤的妻子、早逝的母親，她們可能用比當事人更為熱情期待的心情講述此上榜夢兆，言說當下往往反映著最深切的鼓勵，唯待榜發之後，此間溫暖閃現的記憶遂成為這些文人散落在人生路程上的零光片羽，直到多年後才被拾回。

乾隆《山陽縣志》亦描述嘉靖四十年（1561）辛酉科舉人阮嘉林（1533-?）冬日赴京會試時，遇見山東御史裴天祐（?-?）「夢天榜出，會元即嘉林」²⁴，適時阮嘉林正值喪偶，故裴天祐堅持將女兒嫁給阮嘉林，而隔年隆慶二年（1568）戊辰會試榜發，阮嘉林則為副榜第一。但是副榜終究不如正榜，此事在清代經學家阮元（1764-1849）〈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中有更詳細的說明，內容主要梳理揚州阮氏家族之先祖與淮安大河阮氏之關係，雙方皆在明代萬曆天啓之際「由淮遷揚」，然而人名方面卻有若干闕疑處，阮元追溯淮安大河之阮氏傳承時，便提到阮嘉林一支，亦述及北上會試遇見微服出巡的光祿寺卿裴天祐之事：

蓋裴公以繡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為阮某。裴時有愛女及笄，擇壻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為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²⁵

²³（明）何三畏：《雲間志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8冊影印明天啟刻本），卷18，葉7上。

²⁴（清）金秉祚等修：《（乾隆）山陽縣志》（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卷15，葉47下。

²⁵（清）阮元：《學經室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第16冊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卷2，頁367-368。

此處除了解釋阮嘉林的副榜原因，另外，裴天祐的出現既成爲天榜的告知者，亦爲阮嘉林再得良緣之關鍵，故天榜經歷使阮嘉林生平事蹟增添一處特異亮點。更重要的是，就這則家系爬梳的言下之意，裴天祐之女讓原本「生齒不繁」阮氏宗族自此興昌，此亦天榜促成的命運安排。

到了清代，天榜經歷仍舊是地方鄉里紀錄上的重要材料，然其敘述重點已不僅著重於此抹人生神異色彩，更多時候，這些文本與其說旨在描述天榜，更著重的是藉天榜之事「描述某人」，換言之，天榜作爲文人生平事蹟的一個特殊現象，若曾有過相關經歷，必然不會被紀錄者忽略，有時也是應酬材料之一，例如清代石韞玉（1755-1837）爲墓主周篤所作〈贈奉直大夫周公墓志銘并序〉，稱其「困于童子試甚久，洎夢見天榜，遂易名，補博士弟子員」²⁶，此文乃係周篤之子託石韞玉寫就，天榜一般多指鄉試或會試結果，但周篤生平可能缺乏顯著事蹟，子孫意欲使其人生經歷更爲輝煌豐富，故也成爲此銘文之材料。

（二）證榜：靈驗異事的脫逸敘述

上節討論的天榜例子中，多數人終究現實榜上有名，少數者如王涑卻是九上公車卻無一命之榮，畢竟天榜之說能夠深入人心，必然建立於能夠「應驗其事」之上，透過鄉里間知名人物的例子，使得天榜之說能廣爲流傳。換言之，若無法應驗，則將成爲鄉野笑談罷了。綜覽天榜敘事除了是個人生平的一環節外，天榜故事之發展蓬勃，與故事中透過不同細節以應證天榜也有關係，這些細節造就故事的趣味感與期待感，在流佈上也能更有效的散播。

1. 更名與證榜的關係

面對飄渺未知的考試命運線索，只要有一絲微弱的可能性存在，大凡所有積極求仕者皆會伸手抓取，以夢榜者爲例，若發現夢中榜單的人名與自己有若干相似處時，多數當事者必然持有一種「寧可信其有」的心情，認爲此乃天意暗示，定會試圖採取若干相應舉措，以符合天命。眾多例子中，最常見類型當爲「改

²⁶ （清）石韞玉：《獨學廬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47冊影印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卷5，頁392上。

名」，為符合夢兆而更名以求功名的例子自唐代便可見，例如《感定錄·李言》載有一人名為李嶽，屢試不第，卻在夢中聞人云「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故醒後更名為「李言」，遂中第。²⁷或者《傳載·豆盧署》記載「豆盧署」本名「豆盧輔貞」，現實中上司令其改名，並且給予三個選擇，同時又於夢中見亡父指示「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四」與「者」的結合正是「署」，故改名應之，後果如夢中所言應驗。²⁸

為應驗夢中所見而更名者於明清天榜文本中也很常見，晚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戊戌鼎甲先兆〉記載萬曆戊戌會元顧起元（1565-1628），其父為萬曆二年進士顧國輔（1538-1594），原冒籍改姓張，但某日卻遣書令起元復姓「顧」，並且更名為「起元」，待及榜發，眾人發現同榜者竟不只一個「起元」，故盛傳其父夢天榜而改之。²⁹

清代法式善（1753-1813）《槐廳載筆》卷十五為「夢兆」之卷，內容蒐羅自各種民間傳聞與明清文人筆記，其中四十五條文本幾乎皆與科舉有關，可知科舉活動深入日常人心，成為眾人潛意識底的焦慮因子，致使眾多科舉夢兆奇聞頻傳。此間自然也有關於更名證榜的文本，其中有一則選自《三岡識略》之〈天榜〉，細思之後其實充滿疑點，內容描述某朱姓提調撫軍於考場中夢見神人云「天榜有馬天選者尚未到」，但當時闈門已封鎖，朱姓提調撫軍感到非常疑惑。未料隔日竟有馬生因「卷損」求易，故朱姓撫軍與卷同時，竟還囑咐馬生改名為「天選」，最後榜發果中第。³⁰然細思過程，考場題紙數量是固定的，負責送發題紙的提調，若已按考生人數發放題紙，並保留若干張於案解部，³¹則為何仍有多餘卷紙可發？此故事含有諸多尋思之處，嚴肅省視後，或可視為人間通關節的最佳掩飾藉口。

²⁷（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156，頁1122。

²⁸（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6，卷278，頁2205。

²⁹（明）王同軌：《耳談類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說四庫全書》集部第10冊影印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唐晟唐昶刻本），卷14，頁99下。

³⁰（清）法式善：《槐廳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78冊影印清嘉慶刻本），卷15，頁477下。

³¹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頁74。

2. 充滿誤會的證榜

另有一種例子卻是天榜榜單並非遲到，反而是太早公布，直到若干年後同名者上榜，才能瞭解此間真意。例如清代筆記《熙朝新語》卷五記載順治時期，徽州舉人汪曰衡夢見天榜會元名「汪士鋹」，汪曰衡便採取最常見的作法——易名應之，然至其臨終皆無果，直到四十多年後，康熙丁丑會元正是著名文士「汪士鋹」（1658-1723）。此事由汪曰衡之孫傳出，更顯出一種命運的荒謬感。

此外清代畫家錢維城（1720-1772）亦曾夢見天榜，但夢裡所見狀元為「金谿李建中」，自己則居探花，然放榜之後，自己卻是狀元，反而李建中落於二甲，此二事或亦為當時流行的民間傳說，故同見載於《熙朝新語》與《新齊諧》，二書作者不約而同地感到天榜之「不可解」，³²而《熙朝新語》更進一步指出此事的矛盾性：「謂夢為無據耶，何以姓名巧合？謂夢為有真耶，不應前後顛倒，豈臨期亦有更換耶？」³³這段話說明天榜之所以令人無法置之不理的原因，便在於其曖昧模糊的待驗證性，清代齊學裘（1803-?）《見聞續筆》卷五〈夢出天榜〉中的徽州老叟夢見天榜之後，僅記得夢中二事：「第四名為『牛雲芬』」以及「考題為『才』字當首」，考試結束後，考題確實出自《論語·泰伯第八》的才難四句，但是牛雲芬卻是倒數第四名。³⁴類似文本如清道光年間吳熾昌（?-?）《客窗閑話》記載同鄉劉君因屢試不中，故棄科舉而走向幕僚之業，某年夢見自己名列天榜第一而再度重拾舉業，不惜納監入闈，沒想到居然頭場便犯規，成為另類的第³⁵一。

興許是為配合夢境的背景，故烘托出恍惚曖昧之氛圍，除了造成耳誤的唱名

³²（清）余金：《熙朝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78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卷5，頁616上。同事又載於袁枚《新齊諧》卷三〈兩汪士鋹〉，見（清）袁枚：《新齊諧》（上海：上海古籍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788冊影印清乾隆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卷3，頁452上。

³³（清）余金：《熙朝新語》，卷11，頁679上-679下。

³⁴（清）齊學裘：《見聞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82冊影印清光緒二年（1876）天空海濶之居刻本），卷4，頁427。

³⁵（清）吳熾昌：《客窗閑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263冊），卷8，葉14。

外，因模糊不清榜單而產生誤會亦成爲常見例子，又如《槐廳載筆》卷十五記載一則王姓士人夜夢天榜，見會元姓黃，然底下名字看不清楚，恰逢王生與黃姓友人共赴公車，夢醒後遂向黃姓友人道賀，最後卻是一場誤會。³⁶或因爲建立於夢境基礎上，本就是一種非正常得知的管道，故縱使失望，當事者也只能不甘心地接受後果。《熙朝新語》卷一亦有類似二事記錄爲同一則，其一爲順治甲午（1654）年間有士子名爲「金良」，夢中見天榜解元亦爲「金良」，沒想到榜單揭曉後，「及揭曉解元乃鍾朗，夢中僅見其半耳」³⁷。其二則是順治己亥（1659）八月再行會試，有舉人朱士綬夢見天榜，榜單上的會元爲朱姓，名字的部分甚爲模糊，只能看到爲單名，且是金字偏旁。因此朱士綬便更名爲朱鎔，但是榜發後，會元卻是「朱錦」。無論是「金良與鐘朗」或者「朱錦與朱鎔」，字跡的模糊或缺漏造就誤會，這些脫出常軌的結果卻沒有影響天榜的真實性，這兩例最終都驗證了天榜。

《熙朝新語》曾評斷這些驗證天榜卻也使當事者大失所望的故事：「豈神或戲之與？不然何其巧也」，眾人的徬徨源自於天榜之說已然深入人心，聽聞各種夢想成真的故事後，無論是改名應之或者先行準備相關考題，對汲汲營營於科舉功業的士子們而言，幾乎無法抵抗中榜的甜美想像，文本藉由營造時間線上兩端情緒之落差：一方是夢見天榜之喜悅，另一方則是榜發現實的荒謬，達到驗證天榜真實與天意難揣的敘事目的，相較之下，下段所討論的敘事目的則單純許多。

（三）驗善：決定科名的功過陰鷲

隨著明代中期至晚期，出現越來越多以天榜爲主題的文本，故事內容的敘事目的亦有逐漸轉移的現象，此點從同一故事經不同人所載錄後，竟產生異樣旨趣更可見端倪。當時曾經流行過一則關於糧戶夢見天榜的故事，故事據說發生於明代弘治辛酉年間（1501），描述山西和順有一糧戶上糧結束，前往布政司取通關的當晚，夢見自己與一省府州縣官員匯集一堂，並聽聞堂上眾官評點且唱名舉人

³⁶ （清）法式善：《槐廳載筆》，卷15，頁477下。

³⁷ （清）余金：《熙朝新語》，卷1，頁574。

榜單之事，隨即又以上述舉子個人之道德操守為據，進行一番名次調整，最後始完成舉人榜單。糧戶夢醒後與他人訴說其夢，其年舉人榜單果如夢中所示。

上舉故事流傳於十七世紀的文人筆記類書中，清代李調元（1734-1803）於自己的著作《制義科瑣記》將此故事命名為〈糧戶夢〉³⁸，李作此書專門記載科舉制度流變、考題特色、考場紀聞甚至名人軼事等，是瞭解明清科舉活動的重要參考。

〈糧戶夢〉這則故事散見諸書，早如明代知名文人李世熊（1602-1686）《錢神志》³⁹、先後出仕明清兩代的官員姚文然（1620-1678）《姚端恪公集》、⁴⁰清代官員趙吉士（1628-1706）《寄園寄所寄》⁴¹以及清代學者陳夢雷（1650-1741）編纂《古今圖書集成》⁴²等作品中皆有抄錄。從紙本的傳鈔可知，這個據說是明代弘治年間的故事，至少流傳一個世紀以上，在天榜故事中，堪稱是影響力頗大者，考究其流傳之廣的原因，除了志怪文類常見傳鈔性之外，其所具備的敘事功能「驗善」可能也是主因。

這則故事於不同文人的手上傳抄，固然文字略有不同，造成若干情節上的差異，但並未產生故事情節的變化，例如最初糧戶入夢之場景，李世熊《錢神志》僅稱糧戶「忽夢縣尹，至省城南門，徹儀從」並帶領糧戶前往堂上；姚文然《姚端恪公集》則表示另有「一青衣捧馬」引領進入；而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云糧戶「夜宿廟旁，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乃係記載中最為富麗堂皇者，故事結語也多以「餘皆如夢」、「皆符所夢」等收尾，因此可知各傳鈔版本的大致相同，故事情節上並無變化。

³⁸ （清）李調元：〈糧戶夢〉，《制義科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第897冊），卷3，頁100-101。

³⁹ （明）李世熊：《錢神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8冊影印清同治十年（1871）活字本），卷6，頁633下。

⁴⁰ （清）姚文然：〈功過格拈案·倫常第一〉，《姚端恪公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冊影印清康熙桐城姚氏刻本），卷7，葉3下-葉4上。

⁴¹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5冊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10，頁413。

⁴² （清）陳夢雷編纂，蔣廷錫校訂：《方輿彙編：職方典》（成都：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5年，《古今圖書集成》第8冊），卷368，頁11067-11068。

根據故事內容「因品行優劣」大致可分為「志異」與「勸戒」兩大敘事目的，於不同的傳鈔者手上，則產生不同旨趣。在情節未有變化的同時，如何導致敘事旨趣乃至目轉移呢？事實上，檢覽幾則〈糧戶夢〉文本後，將可發現文末不同的評論贊語將造成閱讀感受出現差異，同時也產生迥然不同的閱讀旨趣。例如李世熊稱「余謂放天榜定矣，而三人者自負其天，而天復不定矣，可畏哉」⁴⁹，從李言可知，當時天榜之說已流傳甚廣，故對於「天榜乃是他界榜單」之說已不陌生，但他自承過往對於天榜定見可能有誤，針對此事的評論也無關天榜存在與否，而是思考究竟其是否為民間流傳的樣子，意欲突顯出「天意叵測」之主題。整體而言，李氏紀錄故事目的仍著重於志怪文類的述異特質。

李世熊眼中的「天意叵測」卻成為姚氏認定的「天理昭昭」，故姚氏於抄錄故事之餘，尚增添一大段批評：

嗟乎，天榜已定之後，縣官得以糾舉而除其名，眾官各舉所知而補其數，是陽間所中者文章，而陰間所中者德行矣。自隋唐以文章取士，而周漢以來鄉舉里選之法，陽間不用而陰間用之。蓋幽明二教彼此相成佐，其不逮如車二輪，如鳥雙翼，烏可偏廢哉？且和順縣城隍，陰間豈少皂隸衙快，而必借陽世一糧戶跟入會議府，其故何也？亦是城隍一片婆心，指引讀書之人一條求功名取科第正路，便在家庭日用間甚是簡易直截，托糧戶口中說出即是現身說法，活城隍也。

從姚氏之言理解〈糧戶夢〉這個已有一定傳播基礎的故事，從中可注意三點：首先是天榜的「變動性」，受到上榜者之作爲影響，若是當事者有不道德的行爲，他原本名列前茅的科舉成績則會遭到落榜的懲罰；其次，故事中議動天榜的諸眾者皆爲「一省府縣官」，並未提及「陰間」隻言片語，但姚氏卻逕指「陽世／陰間」的二元對立存在，並肯定其爲互相影響之關係，展現出民間對於幽冥世界密切影響常世的想像。最後則是作者個人隱微的批判，雖然陽間以科舉取才，但他

⁴⁹ (明)李世熊：《錢神志》，卷6，頁633下。

似乎認為類似漢代察舉之法的陰間形式應作為陽世舉材之輔佐，文中隱約流露出對現有制度略有不足的遺憾與批評。

因此，就姚文然所言，此處雖不言天，但糧戶所夢一事其實是幽明二教相輔相成的結果，換言之，就是「天道」或「天理」的顯揚，姚文然將這則故事收錄於其個人集中的「功過格拈案」，此為當時熱門的勸善說，其基本理論與宗教上的功德果報有著緊密的連結。所謂功過格，日本學者酒井忠夫解釋為「將中國的民族道德區別為善（功）與惡（過），具體地分類記述，並以數量計算善惡行為的書籍」⁴⁴，最早此乃道士記載個人善惡功過的本子，然自袁黃（1533-1606）以降，諸多崇尚佛教戒律或者道教修行清規者，他們可能同時也是普通的士人，然而一律皆開始奉持之，尤其是功過格倡導積極立命之學，更使得許多文人、士大夫信奉不已。包筠雅（Cynthia Brokaw）研究功過格認為明清時期的功過格編纂工作相對於過往的個人創作，更接近於文人群體努力的結果，這是一個從「完善個人道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過程，不同身分者各自擁有如捐募贊助、參校檢訂等不同的工作分配，⁴⁵此時期文人士紳在表達對於社會失序、人心腐敗的不滿後，透過功過格中種種故事及其修養守則的傳播，使得閱聽者得以透過功過格的教訓改善品行，進而使得社會整體道德質量發生改變。⁴⁶

〈糧戶夢〉作為當時甚為有名的天榜文本，廣受流傳的原因之一或許與榜單上諸位人名皆是當時頗受尊敬的真實人物有關，檢視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科之山西解元確實便係大同人「李翰臣」，李作為當時的知名官員，仕途雖遭逢小人陷害而屢遇困厄，但治理地方卻有名聲，亦曾追擊流寇，並以計擒盜匪，可說是受到百姓歡迎的官員類型。「陳桂」事則可見於《山西通志》，記載其事蹟「先是弘治辛酉，邑人夢城隍言第六名陳某事繼母至孝」⁴⁷，同樣也具有頗富地方聲望

⁴⁴ （日）酒井忠夫著，許洋生譯：〈功過格的研究〉，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2年），頁497。

⁴⁵ （美）包筠雅（Cynthia Brokaw）著，杜正貞、張林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68-170。

⁴⁶ 同上註，頁175。

⁴⁷ （清）覺羅石麟等監修：《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卷144，葉1上。

的有德形象。

換言之，天榜故事既能滿足百姓的述異言怪的好奇心，本身也具有宣傳善行德風的意義，故不斷被講述的過程中，其建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特質，也逐漸往教化人心的方向前進。從〈糧戶夢〉可看出天榜主題具有鞏固天命果報之結構的價值取向，再舉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三〈雷部判官〉一事，選自《白醉璣言》，藉一名中年遊神冥府的儒士程學聖之口，說明天榜的變動源自於上天的伺查，人心的善惡變化才是影響放榜結果的真正關鍵：

蓋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為惡，能猛省痛改，神即鑒其馨，故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登第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⁴⁸

也因此，人只要能夠遵守本分、行善積德，便有可能獲得理想結果，此類故事為強調道德心性的重要，甚至認為在人品與學問之間，僅僅是精進學問也不代表一切，唯有誠實無欺才有可能獲得功名。此外，也透過明代兩個真實人物的「潘雪松（士藻）、祝石林（世祿）」的上榜經歷以證明天榜驗善的真實性。

天榜驗善的常見情節可見於考生無法守善棄惡時，則上天隨時可能予以懲戒，如《槐廳載筆》記載有人夢乾隆戊戌（1778）科會試「天榜異動」，稱狀元原本並非戴衢亨（1755-1811），但因戴不以未婚妻貌寢為意，講究信諾，故聲名遠播，而原本的天榜狀元奚某則因父「病其聘媳貌陋，不足以為子婦，卒休之」⁴⁹，於是空中出現神秘聲音說明後，便黜奚而易戴。

從驗善目的延伸，又可說明天榜之所以難測異動，實乃檢測世人是否能夠堅守德行，甚至不受誘惑再度產生邪念，換言之，天榜甚至是上天給予人的一種「試煉」。《金壺淚墨》為清人黃鈞宰（1826-1875）所撰寫的文言小說集，其記載道

⁴⁸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0年，《明清史料筆記叢刊》清代第192冊），卷3，頁287。

⁴⁹ （清）法式善：《槐廳載筆》，卷15，頁483。

光甲午（1834）到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的社會雜事，也包括各種勸世教誨的省思作品，其中有一篇故事描述揚州王生受繼母鍾愛扶養長大，然因誤交損友，流連秦淮風月之地，直到繼母悲切懇求，王生始悟，答應不再縱情聲色。此後，家鄉有人夢天榜見王生名，於是王生赴省試應考，卻在途中打破與繼母的約定，再度踏入妓院，當宿王生便有異夢：

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卧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阜邑人，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秦淮醉卧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叩諸乩壇。乩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⁵⁰

王生醒來後果然落榜，此故事前後婉轉曲折，文本透過王生的憤憤不平以帶出主旨，從乩童所降神意可知孝道為人倫第一，而王生所犯之罪其實是破壞約定，欺親之罪當無可赦，故其潦倒終生的結局也是一種天理昭昭了。

四、他界背景下的三種故事主題

明代後期以降，更多此前未見的天榜主題故事出現在文人筆記的志怪故事中，此類文本不僅說明天榜故事在文人筆下輾轉流傳，也是故事早已盛播民間的結果。整體而言，隨著故事更趨豐富化，亦能見到描述天榜的各類細節，以天榜出現的時間點為例，由於天榜多關係著鄉試與會試之結果，故民間也發展出一套天榜的

⁵⁰（清）黃鈞宰：〈心影下〉，《金壺淚墨》（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明清史料筆記叢刊》清代第30冊），頁372。

「發布流程」：例如《堅瓠秘集》卷三所記載的兩則故事，首先是出自《聞見卮言》的〈泰山錄事〉，左姓鄉民自言為「地府總司諸役」，其云「科名之事，如來年八月放榜，今年八月先從地府起送，曰『地榜』。各府城隍查其當與薦者，上之總司以達天曹，至來年正月天榜列示」⁵¹。從文字中可看見地府至天曹那層層遞進的上下秩序空間，相較過往，此時其頒布天榜之處不單純只是夢境遊歷者所見一處未知富貴之所在，他其實代表著天曹地府等神聖秩序之存在。另外一則是上述〈雷部判官〉，內容借休寧儒士程學聖之口云「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二者說法雷同，表示天榜的出現多在科舉考試的半年多前，與清代科舉時間對照，凡鄉試多舉行於秋季，會試多舉行於春季，故秋闈天榜放於是年正月，春闈則可能出現於前一年十月。這兩則文本展現時人對於天榜故事背後的他界想像，隨著內容中時間越趨詳細，這些細微處也使得「天榜」與原有「夢榜」故事呈現出較為不同的著重點，以下討論在他界背景的設定下，常見的三種故事主題，首先是人們在面對未知神秘的榜單時，往往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天榜，但這種認知有時會產生誤解，例如此名單可能並非科舉名單。其次延續上節驗善脈絡，由於天榜的他界性質，使得這個榜單的獎賞意義具有神聖性，但此獎賞於尚未落實之情況下，仍充滿諸多不確定性，故若以「他界鬼神惡作劇」之角度觀察天榜故事，將可窺視現實人心中投機勢利的一面。第三種則是「天榜有名」就能防止鬼魅近身的故事主題，這裡頭展現時人對於官命祿位的想像，背後則可延伸至剋制精魅的文化思維。

（一）傳達神秘訊息

文人透過對於虛構的他界榜單之反思，往往能隱約批評現實的制度，明末清初尤侗（1618-1704）作傳奇《鈞天樂》，借清代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場案諷刺科舉制度，也展現現實中的腐敗面，故事描述才子沈白、楊云於人間試場受屈遭黜，卻於天界獲得狀元、榜眼之榮耀，其中第十八齣齣名即〈天榜〉，戲曲內容著重天界開榜的喜慶場景。因此，描述天榜所在地點，也成為天榜故事發展

⁵¹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3，頁287。

的變化之一，從文本對其所在處的描繪，折射出一種他界的想像。

多數天榜故事發生於夢中，但亦有部分出自於「奇遇」，或許這是因為「趕科舉」乃係明清科舉士子日常生活的一項，由於旅行乃係一個「從此地至彼地」的過程，對於過往交通不便的古代而言，本就具有模糊不定的雙重性，葉楚炎討論身為科舉中人的小說人物，他們於科考歲考、鄉試會試等不同類型的考試旅程中，經歷著各種規模的地域流動，從中文本也會體現相異特徵以呼應小說複雜的情節。換言之，對於整部小說的情節推動而言，旅程往往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無論是貧窮考生輾轉於科考、歲考間的人生苦旅，或者是舉人赴會試的春風得意，都可能遇見主角帶來命運之轉折的「奇遇」。⁵²

以奇遇天榜的故事而言，清代小說《鏡花緣》第48回〈觀碑記默喻仙機 觀圖章微明妙旨〉描述女主角唐小山為尋找求仙的父親唐敖，來到海外一仙境，赫然看見寫著百名女子姓名的「天榜」：

小山把人名看過，不覺忖道：「父親命我改名，那知此碑一等第十一名就是唐閨臣，並且若花姊姊同婉如蘭音妹妹也在上面，我聞古人有夢觀天榜，莫非此碑就是天榜？為何又有司花字樣？以此看來，又非天榜了。」，因向若花道：「姊姊：你看此碑可是天榜麼？」陰若花道：「我看此碑都是篆文，一字不識，誰見甚麼天榜？」

《鏡花緣》作者李汝珍（1763-1830）為天榜之說廣為人知的清代人，《鏡花緣》故事背景為唐代武則天以科舉選才招募女官，此時故事發展至唐小山正好收到父親唐敖之信，囑咐她改名，返國參加女科；這兩種背景造就場景中這塊與科舉榜單無關的仙榜，被唐小山第一時間順理成章地誤會成「天榜」。

唐小山看見天榜之前，《鏡花緣》已花了一回的篇幅描述她如何與友伴陰若花跋山涉水地找到小蓬萊山，並透過帶著唐敖書信的神秘樵夫之指引，發現載有

⁵² 葉楚炎：〈地域流動中的情節建構——論明代科舉制度對於小說結構的影響〉，《甘肅社會科學》第4期（2009年7月），頁132。

人名的白玉碑，這個探尋過程之迂迴曲折，以及此地種種具有各種隱喻性質的名稱（「鏡花塚」、「水月村」、「泣紅亭」），顯見此處並非常人所在的世俗世界，身為百花仙子謫降塵世之化身的唐小山，「鏡花水月」之於她，實為一種滌盡凡心塵念的「點化」，⁵³小蓬萊本是常人無法輕易到達之處，唐小山得以自此界過渡到他界的關鍵應是帶來唐敖書信的「白髮樵夫」，其結合了「智慧老人」以及「漫遊者」兩種相當具有象徵性的心靈原型意象⁵⁴。

現實生活中若欲遇見天榜，似乎也唯有奇遇才有可能了，文本多半如《鏡花緣》般營造出一種誤入仙境的文本空間，或者「神人出現」以呈現天榜，例如《雲南通志》便有嘉靖年間二士人赴考途中，遇見「虎榜」與「天榜」二事，其主角分別遭遇神秘的道人與雲間神人而知天機，道人示之一笥記載上榜人名，而神人則出聲說出暗藏入榜者姓名的隱語以提示之。

來自他界的唱名訊息並非皆令人開心，袁枚《新齊諧》有一則〈韓宗琦〉，講述其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甚至已考取秀才的優異外甥「韓宗琦」之事，此名少年在「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告知母親他的一場奇夢：

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⁵⁵

由於當月正是鄉試舉辦之月，可想見此聰敏早慧少年可能在科考壓力下日有所思、

⁵³ 李豐楙：〈罪罰與解救：《鏡花緣》的謫仙結構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7期（1995年9月），頁147。（DOI：10.6351/BICLP.199509.0107）

⁵⁴ 原型意象參考卡爾·榮格（Carl G. 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新北：立緒出版社，1999年），頁63-65。在中國的許多故事文本中，「樵夫」時常扮演故事遞演過程中一名「關鍵卻無名」的角色，他讓原本可能山窮水盡的主角於迷途中再度找到轉機，或者他可能自己就是一名迷途的流浪者，透過他的經歷，使得讀者得以看見一個非凡世界的產生。

⁵⁵ （清）袁枚：《新齊諧》，卷19，頁509。

夜有所夢。此故事前段情節與眾多夢榜故事雷同，故少年與家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必然就是民間傳聞有關科舉預兆的夢天榜，故「自以為天榜有名，此科當中」。但是這則故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劇情發展，之後韓宗琦於鄉試考場交卷前，突然聽見考場中有聲音大力疾呼「韓宗琦，好歸去也！」然而，事後詢問友人，卻沒有一個人聽到這個聲音。

此故事的結局是少年名落孫山，憂鬱而死，卒年十五歲，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個少年過度偏執的科考悲劇，但此天榜故事並不僅僅是一個「未落實」的預兆故事，故事後半部描述這名少年臨終前的景象：

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為玉帝生日云。⁵⁵

這個故事的轉折處在於眾人對於天榜的誤會，而最後的俗傳玉帝生日則是記錄者為整起事件所下的一道註腳，略略慰藉早殤少年家人的悲傷。雖然天榜從「天意指示人間功名之榜」成為一份「死亡名單」，但依舊是來自他界的天意顯揚，這則故事某種程度反映出在令人激動歡喜的天榜名單背後，仍舊藏著人面對未知的恐懼。

（二）嘲弄現實人心

過往多數夢榜故事的登場人物大致環繞在上榜的「當事者」以及榜單的「見證者」，除了見證者即考生本人之外，其他也多是與考生有關聯的人士，除了親朋好友之外，另外亦有同鄉里人士、考官或者揭榜官員等等，然而明清天榜故事逐漸有一些與上榜考生毫無關聯的陌生見證者出現，而他們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僅僅是見證者，他們甚至展現出一種投機者、勢利者的形象，成為天榜故事

⁵⁵ (清)袁枚：《新齊諧》，卷19，頁509。

另外一種勸善懲惡敘事類型。

《耳談類增》的〈申殿元〉⁵⁷描述一名武昌縣屠夫夢天榜狀元為「徐時行」，文本並未說明屠夫究竟是眼見榜單或者聽聞唱名，然透過現實放榜的結果可知狀元即後來的萬曆首輔申時行（1535-1614），由於申時行自小過繼徐姓舅家，故幼時姓徐，此處「屠者夢不謬，其人非耳」亦為驗證天榜的一種脫逸敘事。據《耳談類增》作者王同軌所言，其伯父與申時行為同榜進士，故曾向其言此事，為之絕倒。

若從天榜主題的發展脈絡觀察此文本，〈申殿元〉相較過往故事中，天榜見證者「武昌屠夫」的角色位置極為特殊，假使過去意圖更改命運者多為當事者及其親人，此處毫無關係的武昌屠夫不僅是天榜見證者，甚至也一同擔任起意圖以一己之力拼搏富貴以改造命運者。換言之，此則故事主旨不僅止於描述武昌屠夫的誤會，文本於「屠夫夢天榜」與「現實榜發」二情節之間，描述屠夫醒後，開始探尋夢中聞見的「徐時行」之蹤跡，後於隔江某里尋獲一同姓名書生，於是屠夫大肆款待書生，並云「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然而這個結果卻是巨大的悲劇，書生因背負期待而過度用功，導致生病且嘔血死亡，作者評之云「以損其賞，又斃我里秀才，必鬼物以其名同，成此一段戲劇也」用鬼物的惡作劇解釋，藉此突顯出屠夫愚昧與書生被過度期待的悲哀。

另外也有一則天榜見證者「投資」失利的例子，來自於清代《諤崖脞說》所記載的〈詫異〉⁵⁸，內容講述杭州老翁夜夢天榜，醒而恍惚憶起第一名有「陳定」二字，後果遇一名寒門士子「陳定」，老翁盡心款待，但最後仍一場空。相較上則〈申殿元〉，〈詫異〉更一方面著重刻劃老翁的勢利表現，所以「至秋虛中堂以寓應舉之士。然款門來者，必首問姓名，無協夢者，悉以他辭拒之」；另一方面又描述他的愚昧投機，故在士人陳定已婚，並生有嫡子的情況下，老翁與妻猶抱著「天緣不可失，即以側室，處之貴人，必光我門楣，勿疑也」的心態，將視

⁵⁷ （明）王同軌：〈申殿元〉，《耳談類增》，卷14，頁96下。

⁵⁸ （清）章楹：《諤崖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7冊影印乾隆三十六年（1771）浣雪堂刻本），卷3，頁301-302。

若珍寶的獨生女兒嫁予為側室，最終卻換得「然不數年，其女竟以不容于嫡，因鬱夭死」的淒慘下場，文末批評此翁一念勢利之私，為造物所侮弄，重點是講述者並不直言此為鬼物作祟，反而更強調人心意念的作用。

晚明以降，參與科舉人數與錄取名額之間的比例愈趨懸殊，士人獲得功名的機會越來越小，面對愈趨嚴苛的現實環境，也逐漸產生越來越多社會怪象，尤其是讀書人面對科舉考試的扭曲偏執或者荒腔走板的理解，在事前預測與事後結果之間的巨大落差，表現此間人心扭曲的作品頻繁出現，例如著名作品《儒林外史》也藉著天榜嘲諷了一回。《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描述王舉人與周進講述自己所作之夢：

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里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著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⁵⁹

說話當下，王舉人身分高於周進，態度輕率不說，對於荀玫也充滿不屑之意，然而等到第七回〈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周進已然高昇，並點撥范進提攜荀玫，此後荀玫成為年輕探花，而王舉人再度出現拜見，並稱荀玫與自己「天作之合」、「都是天榜有名」等之熱絡拉攏之言。⁶⁰王舉人此前面對周進與天榜的鄙視嘲弄之語，以及後來的熱絡吹捧突顯出人心極為勢利的現實一面，這也是天榜故事的一種發展。

（三）官命祿位想像

「天榜有名」暗示著科舉功名的到來，就世俗的角度而言，也意味著富貴榮

⁵⁹ （清）吳敬梓著，徐少知新注：《儒林外史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第3回，頁31。

⁶⁰ 同前注，第7回，頁112。

華的物質生活指日可待，但除此之外，官運仕途既然源自於天的賦予，則其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神聖性，甚至可能影響鬼物。例如傳統道教法術中「印鑑」之使用實源自於現實官署中的兵符印鑑，官員擁有權力與威望，能夠治理掌管民間百姓，而印鑑等物正是陽間官府的權力象徵物品，此概念源自於模擬巫術（imitative magic）中的相似律（law of similarity）與象徵律（symbolism）運作，即認為相似之事物或者具有象徵性的物品，本身具有一種富影響力的力。⁶¹

因此，人間官府掌握陽間秩序，此掌握秩序之權力也可能影響他界秩序，甚至可能擁有震懾他界鬼物之能力，故民間故事出現官命在身者深受鬼物忌憚之情節，亦不足怪。此種身負官運使得鬼物恐懼的思考，也出現在天榜故事中，清代中期慵訥居士（1757-1820）《咫聞錄》記載一名欲尋仇女鬼出沒於鄉場，她錯失仇家，轉而對主角宋某託出含冤往事之異聞，故事描述女鬼出現正在鄉試的宋某面前，其時宋某正半睡半醒間，女鬼稱「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願以情訴」⁶²，其後榜發果然如女鬼所言應驗。

另外，袁枚《新齊諧》亦記載一則〈七盜索命〉，描述杭州秀才湯世坤以塾師為生，某天夜裡遭受七名無頭鬼怪侵擾，後因暫入冥府，始知自己的「前前世」為一知縣，當時受到七名盜賊之賄賂，雖然表面拒絕，最後卻又貪取他們藏起的金錢。故事錯綜曲折，涉及三世輪迴，而七名盜賊對陰官所哭訴之語，也是當時人對於擁有官命者的想像：

吳令初轉世為美女，嫁宋尚書牧仲為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托生湯家，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被文

⁶¹ 參見李豐楙：〈六朝道教鏡劍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31-250。

⁶² （清）慵訥居士：《咫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70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卷3，頁716-717。同事又見於王培荀（1783-1859）《鄉園憶舊錄》，二者成書時間接近，說明此故事可能是當時流行的民間傳說，未見於古籍，但相近年代的文人互相傳鈔，見（清）王培荀撰：《鄉園憶舊錄》（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卷6，葉14。

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千載一時，尋捉非易。⁶³

這七名盜賊鬼魂唯恐前世冤家於今生又獲得官命護佑，所以才急於年節前索討舊債。文本再度指出天榜有名將使邪魔不敢近之說法，同時從「貴人有文名」之線索，可約略發現源自星辰信仰與個體命運結合之思維，例如魁星下凡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換言之，民間大眾對於讀書人的尊重，儼然已與信仰思維結合，並深入志怪述異的書寫成規中，變成一種常見的知識背景。

書寫成規的背後意味著特定認知的普遍化，透過社會文化層面上的理解與推廣，使得文本理所當然地將天榜的各種想像具體為生活常識，影響層面絕對不僅僅只有人。最後再舉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另一則江西奇談為例，文本描述江西地區，某方姓貢生的家中遭受鬼物侵擾多時，那種鬼物是一種黑色的小人，數量日漸增長，「或詈罵之，輒躍起批人頰」，唯獨不敢犯貢生。此後，又過了十四年，此間貢生家人聘請僧人、道士皆無果，甚至還會迎來更嚴厲的鬼物襲擊，甚至在派遣家人前往龍虎山求助時，被派遣者一出家門便會迷路。

直到道光丁酉年（1837），方姓貢生對家人聲稱自己夢見天榜，且名單上不僅僅自身為解元，甚至家中子弟亦多有中式，於是他便於當年六月率領眾多家中子弟前往省城應試。但事實上，方姓貢生根本沒有夢見天榜，前往省城的途中，他完全沒有與任何家人透露實情，反而獨自前往龍虎山「具牒於真人府，請除妖，真人受其牒，判九月朔日雷部施行」⁶⁴，文本最終的結局是眾多鬼怪被龍虎山道士所施法轟落的天雷所殲滅。

上述故事中深切反映時人對於天榜的信任，從貢生謊稱天榜有名，但那一屆的考試中，他們全家並無人中第之事實，可知貢生口中的「天榜」理論上不可能具備任何官命在身的效力，但故事中方貢生卻又是家中唯一鬼物不敢侵者，換言之，貢生不僅能夠哄騙家中眾人，最後也成功欺瞞鬼怪，仰賴的是當時眾人對

⁶³ （清）袁枚：《新齊諧》，卷4，頁343下-344下。

⁶⁴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1，頁567上-568下。

於天榜之說的接受之深，甚至連謊言都能產生影響，側面展示天榜之說已深入文化生活。

五、結論

「天榜」一詞雖可追溯至宋代，但當時僅是「朝廷科舉榜單」的另一說，依舊深植於現實層面，明清時期，天榜成爲「功名前定」故事中重要的科舉預兆代表，它雖與現實科舉榜單有著緊密的關係，卻因預言式的「前定」特質，使得此主題逐漸成爲口耳相傳的街坊傳說，甚至深植人心且對社會文化有著明顯的影響力。此外，雖然來源與說法不一，但天榜越趨詳細的背景設定明顯脫離現世而帶有他界色彩，除了是上榜考生個人努力之外，也成爲上天獎賞此人乃至家族的旨意，此特質使其能夠在真實記錄與虛構文本間扮演乘載個人記憶的重要符碼，也做爲宗教信仰中勸導善惡的重要推手。

相較於世俗的榜單，「天榜」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使其既可以是名人生平略述的奇幻一筆，亦是文人筆記中的誌異題材，各種紀錄文字述說天榜出現的方式，例如夢中透過唱名、榜單、考題的形式展現天榜，或者於現實中巧遇機緣，遇奇人明示等等，並在事後又是如何悟得天機，可看見此類命定故事的基本情節結構雖然簡單，卻猶有諸多變形與延伸枝節。此外，比較唐宋時期的功名前定故事與明代中葉以後的天榜故事，可發現前者多著重「預兆」到「應驗」的情節，強調渲染預兆的神秘性，但明清「天榜」故事發展過程中，重點轉移在知情預兆榜單後，當事者與文本中的相關人士如何面對這份榜單。

從明代中葉以降的天榜文本之脈絡，可發現縱然是同一語境下解釋相同事物，其文本的主要功能性也指涉出多種不同的方向，在諸多文人筆記與類書傳鈔的是「志異」傳統，而與時代風氣緊密結合的則是「勸善」功能，這種勸善功能深植於「人若能爲善則有善果」的功過格理論下，「天榜」成爲天意顯揚的重要民間傳說，隨著故事越趨豐富，天榜文本展現更多不同的複雜樣貌，故事的變化也反映著科舉時代人們對科舉功名的認識與看法。

總言之，透過天榜，得以理解時人如何認識科舉功名，幽微處包括個體如何

因應科場逐鹿產生的焦慮無奈之生命處境，乃至宏觀如明清時人對社會與自然的認知，甚而造就種種新的功過理論依據等，這是研究科舉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個主題。

徵引書目

一、傳統古籍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1986年6月)。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
-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第2841冊)。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第316冊)。
- (明)李世熊：《錢神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8冊影印清同治十年(1871)活字本)。
- (明)劉伯燮：《鶴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1冊)。
- (明)陳士元撰：《夢占逸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說四庫全書》集部第10冊影印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唐晟唐昶刻本)。
- (明)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9冊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錢士升：《賜餘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冊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錢佳刻本)。
-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8冊影印明天啓刻本)。
- (清)余金：《熙朝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 子部第 1178 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
-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55 冊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 （清）文秉：《烈皇小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39 冊）。
- （清）姚文然：《姚端恪公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5 冊影印清康熙桐城姚氏刻本）。
- （清）陳夢雷編纂，蔣廷錫校訂：《方輿彙編：職方典》（成都：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5 年，《古今圖書集成》第 8 冊）。
- （清）覺羅石麟等監修：《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1983 年）。
- （清）金秉祚等修：《（乾隆）山陽縣志》（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 （清）章楹：《謬崖陸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7 冊影印乾隆三十六年（1771）浣雪堂刻本）。
- （清）黃鈞宰：《金壺淚墨》（北京：中國書店，2002 年，《明清史料筆記叢刊》清代第 30 冊）。
-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0 年，《明清史料筆記叢刊》清代第 192 冊）。
- （清）法式善：《槐廳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78 冊影印清嘉慶刻本）。
- （清）阮元：《擘經室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第 16 冊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
- （清）吳敬梓著，徐少知新注：《儒林外史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
- （清）袁枚：《新齊諧》（上海：上海古籍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88 冊影印清乾隆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
- （清）石韞玉：《獨學廬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47 冊據清刻獨學廬全稿本）。
- （清）齊學裘：《見聞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

書》子部 1182 冊影印清光緒二年（1876）天空海濶之居刻本）。

（清）李調元：《制義科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第 897 冊影印函海本）。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270 冊影印春在堂全書本）。

（清）慵訥居士：《咫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70 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清）王培荀撰：《鄉園憶舊錄》（上海：上海古籍，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1820）刻本）。

（清）吳熾昌：《客窗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1263 冊）。

（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錄》（清道光二十二年（1817）青玉山房刻本）。

二、近人著述

（一）專書

（美）包筠雅（Cynthia Brokaw）著，杜正貞等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瑞士）卡爾·榮格（Carl G. 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新北：立緒出版社，1999 年），頁 63-65。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年）。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年）。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二）期刊論文

李豐楙：〈罪罰與解救：《鏡花緣》的謫仙結構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7 期（1995 年 9 月），頁 107-156。（DOI：10.6351/BICLP.199509.0107）

陳寧：〈命運可預知而不可改變之觀念的產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6 卷

第2期（1996年6月），頁147-160。

葉楚炎：〈科名前定觀念對明代小說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21-24。

葉楚炎：〈地域流動中的情節建構——論明代科舉制度對於小說結構的影響〉，《甘肅社會科學》第4期（2009年7月），頁131-134。

（三）論文集論文

（日）酒井忠夫著，許洋生譯：〈功過格的研究〉，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2年），頁497-542。

（四）學位論文

陳振禎：《中國科舉讖兆文化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1年5月）。

白金杰：《清代科舉民俗考論》（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5年5月）。

Predestination, Trial, Mischief - the Imagination of “God’s List” in the Dream Ome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Chen, Hai-Yin

Assistant Professor,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 saying since the Tang Dynasty “officers are determined by the god”, but the word “God’s List” was first seen in Song Dynasty. It was referred to in the Tang Dynasty, successor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rought the “admission list” with successor’s name on it, s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hosts and gods. However,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God’s List” became a common type in the dream ome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preading many things that “see the list in the dream but come true in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taphs and biographies at that time, having God’s List experie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unique note of fame. In the changes of the notes of the literati, God’s List even became an example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boo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s of exhortation of goodn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had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good and punishing evil.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tories of God’s List became richer, besides the most basic example which was the dream come true, there were still many dreams and realities with a huge gap between the records, and even some with a mischievous color. However, mystery novels show a uniqu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world through the saying of the God’s List.

Keywords: God’S List, Predestina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Dream Omen